

◆洪放专栏·蓦然回首

寻找拖拉机

在西双版纳植物园，我最想寻找的，不是那些奇怪的树，也不是各种形色的草，更不是那些已超出我认知的花。而是——拖拉机。

真的，我一直想寻找那台拖拉机。应该是一台手扶拖拉机，红色的机身，像一只巨人版的蚂蚱。1970年代，这种红色的手扶拖拉机，是我们乡下最为宝贵的农用机械。它加上拖斗，可以运货；装上犁铧，可以犁田。黑亮的柴油喝下去，突突突，声音响彻天宇，就像田野上的宣言鼓点。记得我们整个大队才一部拖拉机，只有特别需要时，才会从村部开出来，送农资，或者犁田。两手扶着车把的驾驶员，神气得像夏天的知了。他肩上还搭着毛巾，机头旁边的钩子上，挂着写有“抓革命，促生产”的大瓷缸。在那个年代，拖拉机是一道风景，孩子们会随着拖拉机跑几十道田埂。直到拖拉机停在场子上，才怯怯地上前摸摸。“哇”，拖拉机也有温度呢，滚烫滚烫。

在植物园，我就想寻找这样的拖拉机。我东张西望，目光被植物园的树木一再阻挡，扯弯，变形，但，我总感到会在某一个角落，正放着那台拖拉机。它经历了二十多年的风雨，横跨了一千多公里的路程，从江淮之间来到彩云之南。它肩负着那个时代的使命，也承担着一个人青春时代的梦想与长歌。

我们是在三天前飞过来的。西双版纳对于我们，是一个近乎迥异的所在。亚热带风貌，边境地区风情，五颜六色的少数民族服装，那些黎黑的面孔与夜舞的蝴蝶……尤其是在到来的当天夜晚，遇上突击边防检查。那阵势，对于一向待在老家的我们来说，吃惊不小。倘若要形容，还真有“剑拔弩张”之势。因此，一到植物园，便跟早已等候我们的办公室人员感叹：对方是个年轻的小伙子，只是一笑，说这边是常事。并且说：我们有时候开车之前，都得自己检查一遍，免得被人塞进毒品。要是真被塞带了，那可是大罪。大家于是又都感叹：平静的风景之下，其实暗流汹涌。

我就从那一刻开始，就在寻找了。显然，我的心不在焉被同行者发现了。问我在干吗？我说我在寻找。

“寻找？找什么？”他们笑。我没回答。确切点说，如果我回答，应该是：“找一个人，一台拖拉机。”人是肯定会找到的。我们来之之前，就与她有了联系。她现在正是植物园的一位中层领导。而且，她很快就会到来。当然，我也想象了一下这个人——据说身材中等，很精干。其他的，他们只记得：二十多年前，我们县里在广场上专门召开大会，欢迎自愿支援边疆的知识青年。那青年就是她。那时，她刚刚二十岁。高中才毕业两年，正在县里一家工厂上班。她坚持要求支援边疆，最后被批准到西双版纳。她不仅仅是那个事件的主角，也是那个年代的主角。她从老家出发，出发时，身披红花。而陪伴她的，就是那台拖拉机。

植物园里散发出植物快速成长与快速腐烂的气息。这恰好与我思考的那个事件契合。盘根错节的榕树，看似不起眼的见血封喉树，还有高大的猴面包树，在它们的遮蔽下，那些矮小的热带草木，攀缘，盘旋，沐浴着从大树枝叶间漏下的阳光。她已经走在我们的行列之中，她介绍这些树，植物，口音里还夹杂着一些方言。她面色偏黑，身材微胖，语速偏快。整体印象依然干练。她早已在西双版纳成家，从一个知青成了植物园中层领导。她并不回避我们的提问，说：“一点也不后悔。人生就是这样。”她甚至很佩服二十岁的自己，“想干就干，真厉害。换成现在，哪还敢？”

在西双版纳的那几天，我一直在寻找。但我一直没问。我希望能转角处，在植物园的某个角落，或者在陈列馆，在园中大道上，能看见那台拖拉机。当然没有。我也一直没有问她。但是，我知道：在她心里，那台拖拉机一直在突突突地奔跑着。那是青春，热血，永难再回，却一直滚烫！



洪放，桐城人，中国作协会员，安徽省作协副主席。现居合肥。

◆山河故人

回忆父亲董怀章

董 裔

我的父亲董怀章，1922年12月出生于河北省灵寿县寨头乡水峪村，1938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他是一位机智果敢的战士、指挥员和主政一方的领导干部。

情系太行，抗日救国

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，日本大举进攻中国。灵寿县隶属石家庄地区，石家庄是日本鬼子的战略要地，日寇数量占侵华日军总量的比例很大。日本鬼子经常到周边地区进行扫荡，太行山区是八路军的抗日根据地，为了打击日寇，八路军组织军民积极抗战。

父亲董怀章1938年3月就参加了灵寿县十二乡抗先队和青救会等工作，并先后任指导员、宣传委员和教员。他虽只有高小文化，但积极认真，深受好评。1939年抗日战争形势更残酷、更严峻，父亲积极参加边区公安工作，后又到二区独立大队担任副大队长、大队长。随着战争的磨炼，父亲更成熟老练，逐渐成为一名机智、勇敢、果敢的战士、指挥员，经常深入敌占区打击敌人。在一次战斗中，他和战士们与日本鬼子短兵相接，拼起了刺刀，手臂不幸被刺伤。受伤后，先调到四区大队部担任教学员，后又调入武委会担任主任，随着工作的需要又调到灵寿县爆炸厂（炸药厂）工作，并担任厂长。为了打击敌人，父亲克服各种困难，就地取材，制造出各种石雷，有力地打击了敌人。由于他作战勇敢，1945年后又调入灵寿县武装部作战股任股长，不久后又升任副部长、部长。

听党指挥，南下工作

1949年2月，父亲积极响应党和毛主席“将革命进行到底，解放全中国”的号召，参加了灵寿县南下干部团到安徽省东流县（现东至县东流镇）建立新中国的地方政权。1949年5月6日东流县人民政府成立，父亲担任了第一任公安局局长。



◆人间小景

雨的痕迹

陈雨涵

雨落在那些年曾落过的地方，我已经不在意它们了。当一个事物真正在你的生命中留下痕迹，如刀刻斧凿，往后多年，再难覆盖。更重要的东西已随雨季降临到我的生活中，但我仍会默默倾听雨落下的声音，期待它悄无声息地覆盖住野草疯长。

村庄的雨是无声无息的，它从庄稼的叶子上滑入土地，跟随一道道沟壑进入河流，除了降雨后带给人们短暂的盛大欢喜，再无别的痕迹。生命本身有一个雨季，它没有来临的时候，你很难从雨落的声音中听到一种叫爱恨悲喜的东西。雨在我的生命中留下痕迹，正是我情绪悲凉直面生死之时。

外公死在几年前的一个雨季，在我上课的时候父亲把我喊了出去，我的耳边轰鸣，父亲的声音遥远而漫长，昭示着一个生命的离去。在此之前，我已经预感到雨季的来临。家人随外公一同到外地求医，留我与外婆在家，老人在心神无处安放时总是寄希望于神灵。从出生到如今的漫长岁月中，我的呼吸已同我的亲人们交缠在一起，哪一个呼吸微弱了，绵长了，我都



1949年东流县第一任公安局局长——董怀章(右)

公安局成立后，主要任务有两件：一是维护社会治安；二是剿匪反霸。父亲派公安局人员侦察发现洋湖镇有一支旧的县自卫团，有四个连的兵力，约四百余人，虽逃散一部分，但还有100多人，兵力远超东流县公安局武装力量。由于近处没有解放军的部队，因此父亲决定采取智取的办法应对。父亲亲自带队，一共进行了三次谈判，宣传党的政策，并运用武力进行震慑，最终将其瓦解。

三次谈判都很艰险，特别是第一次，尤其惊险。1949年五六月份，父亲带领赵宝祥、高庭科、刘清太、通讯员何锡海徒步走了五六十里路，到达该自卫团团部。大家又累又渴，可自卫团的人不给水喝，反而端出五碗白酒，企图戏弄公安人员。父亲叫通讯员把商会会长洪泽会喊来，命令他派人到东流县去挑水，给

拾元钱一担，这才把自卫团的团长逼了出来，送来茶水。他们自知理亏，请公安人员留下来吃饭，但又说弄不到菜。父亲说缺什么菜？是天上飞的，还是地上跑的？于是叫侦察科长高庭科提着枪出去了，不一会儿，就带来两只野鸡和几只斑鸠。那团长惊叹不已，想进一步试试公安人员的枪法，于是说：“听说你们枪法不错，打几枪给我们看看怎么样？”父亲等人都是老八路，何惧此言？每人打三枪，父亲打死一只麻雀、一只斑鸠、一只喜鹊，高庭科打了一条蛇，一只麻雀、一块石碑，只有通讯员小何是新兵例外。自卫团的士兵们都齐声喝彩，父亲又乘机叫这个陈团长打几枪试试，结果四枪全打空了。此情瞬间威震了自卫团的锐气，避免了风险。

半个月后，还是父亲带四个侦察员再次来到洋湖，成功缴了该自卫团的武装，这次一共缴获长枪300多枝，迫击炮1门，8挺机关枪，手枪12支。

投身皖江，保卫人民

解决旧自卫团以后，在组建县大队和各区小队时，有不少坏分子混入到区小队里来了。他们和当时的各股土匪及地主恶霸都有勾结，经常携枪逃跑，并勾结土匪攻击县、区政府，伤害南下干部，危害新政权的建设。

为了摸清匪情，父亲等武工队员打扮成要饭的、买猪的、做生意的，两三人为一组，到山区了解匪情。一天，他们来到廖村、马田一带，到一户人家讨饭。几个土匪正在里面吃饭，一个小女孩捧了一碗稀饭给武工队员，队员高庭科用一个破碗接稀饭，不小心把稀饭撒了一地。小女孩生气地说：“这个要饭的真奇怪，稀饭还不要！”还打了高庭科一巴掌，破碗砸翻了篮子，手枪露了出来，一下惊动了小女孩，大叫：“这个要饭的有枪！”这时，里面吃饭的土匪冲了出来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父亲拿出枪来，一枪打死了冲在前面的土匪。这时，其他队员也都赶了过来，吓得土匪们都把枪缴了。经了解，打死的正是他们头目洪希增。

还有一次父亲带领队伍在追赶土匪时，土匪突然甩来一颗手榴弹，正落在队员邢玉昌和王华山脚前，冒着白烟吱吱直响。千钧一发之际，父亲飞起一脚，将冒烟的手榴弹踢到山下的稻田里炸了，同时，父亲迅速将两位队员扑在地上，避免了一次险情，大家对父亲临危不惧的快速反应十分赞赏。

父亲的机智、勇敢、果敢永远驻留在我们心中，而民族、党、人民始终驻留在父亲的心中。

◆小说世情

真相

朱幸福

暑假期间，市报的记者朋友打来电话，让我找几位回乡创业、事业有成的青年典型，他们准备搞一个系列宣传。虽然我对这些创业的青年也不是太熟悉，但我还是答应帮忙联系。因为陪他们一道采访，既能学到采访技巧，给我们县报提供新闻，也能给青年创业者以极大的鼓舞。

我先找到工商联，他们和企业打交道，对全县的企业家了如指掌。他们很快给我推荐了三四个青年创业典型，我也把这些创业青年的基本素材反馈给市报的记者朋友。朋友看了之后，决定先采访一位范姓女企业家，她是做机械制造配件的。

那天一早，朋友带着位摄影同事坐着他们报社的采访车到了县城，先接上我和工商联的女会长，然后，在女会长的指引下，我们到了工业园区，七转八转到了范总的公司。

女会长介绍说，范总的企业是家庭企业，主要为汽车企业生产小配件。丈夫主内，负责生产、技术研发；范总主外，主抓营销。这几年生意很好。在范总的办公室，我们开始了采访。考虑到天气炎热，我们都进了范总的办公室，司机也被范总热心地叫进办公室休息，我顺手将沙发上的一个坤包拿到茶几上，腾出位置让司机坐了下来。市报记者朋友问，范总回答，我也跟着记录，摄影记者则不停地变换角度拍摄。有不懂的地方，我也偶尔插问两句。采访结束后，我和市报记者朋友跟着范总去车间看生产流程，摄影记者也跟着去拍照片，女会长因为来过多次，和范总很熟，处处显得轻车熟路，不停地做补充介绍。在大家对范总的一片钦佩赞扬声中，采访顺利结束。

范总执意要留大家吃午饭，市报记者说急着回去写稿，司机也说下午还要出差，怕时间来不及，发动采访车先走了。我和女会长也不愿影响范总的工作，范总便开车送我们回县城，她先上楼拿一下自己的手包。本以为范总拿一下包不过两三分钟，没想到过了半个多小时范总才从办公楼下来。我以为她临时处理什么事，没太在意。

第二天上午，在走廊里遇到女会长，她突然问我：“你知道昨天范总为什么在楼上耽误了半个多小时吗？”

我摇摇头说：“女人事情多呗。”女会长压低声音说：“范总那天早晨取了1万元现金，用了600元，剩下的9400元就放在办公室沙发上的那个坤包里。她上去取包时，包在，但钱没了。”

“啊？就是我拿到茶几上去的那个包？”我惊讶道，“你怎么当时不说啊？我们每个人现场检查一下自己，也好洗刷一下嫌疑。”

“大家都是客人，范总当时没好意思说。再说，市里记者的车已经走了，你我也下了楼……”女会长解释道，“范总不让我跟你提此事，但我还是觉得说一下对我们今后做事有利，她已经在公司办公楼补装了监控。”

“哦。”我思考良久，还是把此事告诉了市报记者朋友。

“当时没有查，说明我们在场的每个人都有嫌疑啊！”朋友听了，叹了口气说。

因为这件事，市报的记者朋友再也没来县里采访新的创业对象，我在日报看到的专栏报道内容也都是宣传其他县区的典型。显然，他们也在回避什么。我心里总有些说不出的味道，总觉得没能帮助更多的创业者鼓与呼有点对不起他们。

时间匆匆流逝，我也渐渐淡忘了此事。几个月后，县工商联召开执委会，报社安排我去采访，自然见到了工商联的那位女会长和那位丢钱的范总，范总是县工商联的执委。我们客气地相互招呼之后，她们开会，我拍照、做记录。

散会之后，范总将我拉到一边，悄悄地说：“会前，女会长才告诉我，上次你们去采访丢钱的事她告诉你们了。我原本不让她跟你们讲的，没想到她还是讲了。弄误会了，真对不起你们！”

“那钱后来找到了？”我追问了一句。

“嗯。”范总涨红着脸说，“那天我不是陪你们到车间参观拍照去了嘛！我丈夫到办公室找图纸，看办公室没人，我的包又扔在沙发上，他知道我早晨取了款，就将我包里的现金拿出来锁进办公桌抽屉里。他当时忙，忘了跟我说，我也没想到来问他，所以就造成误会了。都怪我平时做事大大咧咧的，真的对不起你们！”

“没事没事，没丢就好。”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，赶紧把这消息告诉市报的朋友。

“她不会是为了安慰我们吧？”市报的朋友听了反问道，“要不，她怎么到今天才告诉你真相？”

“不会吧？！”朋友说的我心里又惶惑起来。

